

赋能与赋权：欧盟战略自主的演进逻辑、 实践形态与未来前景

解楠楠

摘 要：战略自主自2016年被正式提出以来，已成为欧盟全球战略的核心概念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解构战略自主的本体属性，认为其本质是国际行为体普遍的战略追求，表现为动态的权力建构过程而非静态的终极状态。为系统阐释欧盟战略自主的长时段演进，本文构建了“行为体实力-国际体系压力-盟友关系契合度”三维分析框架，并将赋能与赋权界定为实力动态建构的核心机制。研究表明，欧盟战略自主的演进可追溯至二战后重建时期，并在三大变量互动塑造下，历经“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与“地缘政治力量”三种主导形态的迭代更替：从冷战高压且盟友关系紧密的环境下依托经济一体化的“避险蓄力”，到后冷战单极格局中专注于规则输出的“规范拓展”，再到当前高压竞合与盟友动摇背景下追求安全、经济与科技主权的“复合重塑”。未来，欧盟战略自主呈现出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议题分化为特征、以有限自主为目标的“弹性实用主义”策略框架。这一分析旨在超越对战略自主单一的政策解读，通过揭示其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为理解欧盟作为一种持续演变的战略行为体，提供一个兼具历史纵深与理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战略自主； 赋能与赋权； 地缘政治力量； 欧盟

作者简介：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 研究员 郑州 450001

中图分类号：D8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6)01-0029-2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盟战略自主的选择机制、实施路径与中国应对研究”(编号:23CGJ04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2026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感谢《德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力量、市场和文明之一,欧盟的角色定位和政策选择对欧洲未来发展、中欧关系、中美博弈的走向和结果乃至世界格局变化具有关键性影响,这一点在当前世界格局与秩序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尤为突出。2016年,欧盟公布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明确指出:“适当的雄心和战略自主水平,对欧洲在其边界内外促进和平和保障安全的能力至关重要。”^①这标志着战略自主被欧盟提升到重要战略目标的位置。自此,战略自主这一概念成为欧盟全球战略的核心概念和国际社会关注与讨论的热点。何为战略自主,如何把握欧盟战略自主的本质、演进逻辑、发展趋向及其影响成为中国外交的迫切需求。现有关于欧盟战略自主的研究聚焦于战略自主的理念与内涵、必要性与紧迫性、局限与困境、实践与前景等方面的阐释与分析,并形成四类主要观点。

一是源流讨论与防务自主的经典叙事。部分学者认为,欧盟战略自主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St. Malo Declaration)。该宣言指出:“欧盟需要自主的军事能力,以帮助欧盟应对其周边地区的危机。”^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战略自主的辩论仅被视为从美国手里重新获取政治空间的一种手段,常常与北约议题同时出现。2013年11月,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在国防工业领域引入了这一概念,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提升欧盟作为更强大合作伙伴的能力。将欧盟防务研究作为战略自主的基础性研究在学术界基本形成了共识,并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占据主流地位。例如,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将战略自主定义为“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设定优先事项并作出决策的能力”。^③

二是范畴扩展与全球战略自主的叙事。与以往欧盟侧重于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减少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不同,全球战略自主叙事^④远远超出了安全与防务的范畴,向数

^①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an,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2016-06,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gs_review_web_0.pdf, 访问日期:2025-03-05。

^② “Franco — British St. Malo Declaration”, 1998-12-04, https://www.cvce.eu/en/obj/franco_british_st_malo_declaration_4_december_1998-en-f3cd16fb-fc37-4d52-936f-c8e9bc80f24f.html, 访问日期:2025-03-06。相关论述参见伍慧萍:《欧洲战略自主构想的缘起、内涵与实施路径》,载《德国研究》,2021年第3期,第23-45页,这里第28页;丁纯、张铭鑫:《欧盟对外经济依赖与“开放性战略自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166-180页,这里第167页。

^③ Barbara Lippert/Nicolae Ondarza et al.,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ctors, Issue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SWP Research Paper*, 2019, pp. 1-39, here p. 5。其他参见 Jolyon Howorth, “Strategic autonomy and EU-NATO Cooperation: Squaring the Circle”, *Egmont Security Policy Brief*, No. 85, 2017, pp. 1-4; Daniel Fiott, “Strategic Autonomy: Towards ‘European Sovereignty’ in De-fenc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EUTSS)*, 2018, pp. 2-7。

^④ 严少华:《欧盟战略自主与中国对欧战略新思维》,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26-136页,这里第127-128页; Niklas Helwig/Ville Sinkkonen, “Strategic autonomy and the EU as a global actor: The evolution, debate and theory of a contested term”,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Issue 27, 2022, pp. 1-20。

字化、技术、贸易与工业等领域延伸。^①正如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战略自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关联性,其利害关系不仅限于安全和防务,还适用于广泛的问题,包括贸易、金融和投资。在贸易方面,欧盟已实现战略自主,而在金融和投资方面,战略自主建设还有待推进。”^②2020年9月,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在布鲁盖尔(Brugel)智库演讲中也提出:“欧盟战略自主是我们这代人的首要目标,其目的有三——维护欧洲稳定、传播欧洲标准和促进欧洲价值观。”^③米歇尔提出该框架后,欧盟加速推进数字主权、绿色转型与防务一体化,旨在成为多极世界中的“强大全球参与者”。

三是身份与目标的争论,即战略自主应被视为欧盟的特性还是目标。大部分学者将战略自主视为欧盟的战略目标,但将其与“主权欧洲”(European Sovereignty)、“市场力量”(Market Power)、“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和“地缘政治力量”(Geopolitical Power)等一同视为欧洲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以此讨论欧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尽管也有学者强调,“战略自主不是一种绝对的终极状态,而是一个渐进的走向自主的过程”,“是欧盟长期的战略目标”,^④但并没有分析战略自主为何以及如何体现为战略目标,而是侧重于阐释当前阶段欧盟战略自主的内涵与具体行动。

四是现实约束与前景质疑,即对欧盟战略自主的雄心与其实际能力,以及发展前景进行批判性审视。大部分学者认为,尽管当前(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实现欧盟战略自主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但受欧盟内部机制、共识与能力问题以及欧美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难有实质性进展,尤其是在安全与防务领域。^⑤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丰富了对欧盟战略自主的研究,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启

^① Council of the EU, “Strategic Autonomy, Strategic Choices”, 2021-0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9404/strategic-autonomy-issues-paper-5-february-2021-web.pdf>, 访问日期:2025-05-04; European Commission, “Assessing Open Strategic Autonomy”, JRC External Study Report, 2024-01-04,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524071d9-ab81-11ee-b164-01aa75ed71al/language-en>, 访问日期:2025-05-04。

^② Josep Borrell, “Why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Matters”, 2020-12-03, https://eeas.europa.eu/headquarters/headquartershomepage_en/89865/Why%20European%20strategic%20autonomy%20matters, 访问日期:2025-05-04。

^③ “Recovery Plan: powering Europe’s Strategic Autonomy — Speech by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at the Brussels Economic Forum”, 2020-09-08,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09/08/recovery-plan-powering-europe-s-strategic-autonomy-speech-by-president-charles-michel-at-the-brussels-economic-forum/>, 访问日期:2025-05-04。

^④ 伍慧萍:《欧洲战略自主构想的缘起、内涵与实施路径》,第30页。

^⑤ 房乐宪、殷佳章:《欧盟的战略自主追求及其国际含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第57-63页,这里第60-61页;Jolyon Howorth, “Autonomy and Strategy: What Should Europe Want?”, *Egmont Security Policy Brief*, No. 110, 2019, pp. 1-5, here pp. 2-4。

示与基础,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两点局限:一是将战略自主视为欧盟的一个特性,并将其与欧洲主权、地缘政治力量等概念混为一谈,共同作为欧洲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这使得国际社会关于欧盟权力性质的“斯芬克斯之谜”更加难解。本研究认为,战略自主应被理解为驱动欧盟角色演变的元目标与根本动力,而“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地缘政治力量”等则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该目标所采纳的具体身份形态与政策路径。二是现有分析多聚焦于特定阶段(尤其是当前)的政策解读,缺乏对战略自主作为一种长时段历史现象的演化脉络的系统性梳理。且鲜有文献研究战略自主本体,未能构建一个连贯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其本质、揭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态的演变逻辑与实践特征。本研究认为,战略自主是贯穿欧盟历史的根本性战略目标,其具体形态的演进由行为体实力、国际体系压力及欧美同盟关系契合度三大因素的互动来塑造。有鉴于此,本文旨在超越对战略自主的阶段性的政策描述,对欧盟战略自主进行本体追溯,并超越静态的因果分析,为理解欧盟的战略行为提供一个兼具结构性与能动性、连贯性与阶段性的解释框架,尝试回答以下几个核心问题:欧盟战略自主的本质是什么?其作为一种动态的根本战略追求或目标,为何以及如何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与“地缘政治力量”这三种主导性的实践形态?其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未来前景又是什么?

二、何为欧盟战略自主

欧盟战略自主概念的流行并未消弭其理论上的模糊性。为厘清欧盟战略自主的发展轨迹,首先必须回归本体论层面,探究战略自主的普遍内涵,进而追溯其在欧盟语境下的历史根源与实践本质。

(一) 战略自主:基于关系与过程的根本追求

战略自主尽管是近年来流行起来的概念,但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也并非欧盟所独有,而是国际行为体普遍的内在战略诉求。其核心内涵在于行为体在关键领域拥有决策自由与独立行动能力,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与生存安全。

关于战略自主的内涵,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明确共识,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从词义来看,战略自主指国际行为体具有自主决策和自主执行决策的能力,即有权选择在何时、何领域以及与何伙伴执行某项政策或行动的能力,具有战略性和自主性两层含义。所谓“战略性”,是指国际行为体为实现特定领域目标,具备在不确定条件下通过调动军事、经济、外交资源制定高层次、全方位、长期性计划,并加以实施的能力。^①“自主性”是指国际行为体在不受外界胁迫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决策的能力。^②

新德里国防研究和分析机构的S·卡拉亚拉曼(S. Kalyanaraman)将战略自主界

^① 房乐宪、殷佳章:《欧盟的战略自主追求及其国际含义》,第57页。

^② 李志永:《政策自主性与美国退群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4期,第125-155页,这里第132-135页。

定为：“一个国家在不受其他国家以任何方式限制的情况下追求其利益和采取其所喜欢的外交政策的能力。就概念本身而言，战略自主的前提是有关国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权力，使该国能够抵抗其他国家可能施加的迫使其改变政策或克制利益的压力。但在多极秩序中，即使是超级大国也容易受到其他大国施加的压力，这意味着战略自主能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①2019年5月，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将战略自主定义为在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中确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并作出决定的能力，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制度、政策和物质资源。强大的战略自主能力意味着能够制定、修改和执行国际规则，而不是遵守他人制定的规则。^②

从上述界定来看，战略自主具有两大本体属性：一是作为关系性存在，战略自主是社会建构的实践关系，而非孤立存在的“实体”或静止的“状态”。其存在依赖于自主与依赖^③的张力、能动性与时空性的互动以及物质能力与规范权力的共生。首先，行为体的自主性始终嵌入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网络之中，其既需利用外部资源（如盟友、制度、市场）强化自身能力，又需规避过度依赖导致的决策掣肘。其次，根据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战略自主既是行为体主动塑造国际结构（如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的产物，也受制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等级性等结构性约束。最后，战略自主是物质能力（如经济、军事）与规范权力（如制度、价值观）在特定关系结构中共同作用的产物。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是自主的根基，但规范塑造同样能通过价值输出扩大战略空间，形成软性自主。因此，真正的战略自主，是在深度相互依存中有效管理对外依赖并最大化自身政策选择空间的能力。

二是战略自主的相对性与过程性，即战略自主不是一个绝对终点，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地“赋能”（能力建设，enablement）与“赋权”（权威构建，empowerment）的过程。相对性意味着战略自主不是一种绝对的终极状态，也不是某个行为体的特性，而是大多数行为体的本能与追求的战略目标。然而，不同的行为体——甚至同一个行为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推进或实现战略自主的思维逻辑、行为方式不尽相同，其内涵往往具有模糊性、包容性。其自主水平也随议题领域（如安全、经济、文化）和行为体角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尽管如此，维护自身生存与安全，追求自身利益的底层逻辑始终不变。过程性或动态性是指自主性需通过持续的能力积累与制度创新实现再生产，停滞则可能导致自主性退化。因此，将其界定为某一行为体的固定“特性”或与某一具体

^① Aravind Devanathan, “Aravind Devanathan asked: What is ‘strategic autonomy’? How does it help India’s security?”, 2015-01-20, <https://idsa.in/askanexpert/aravind-devanathan-asked-what-is-strategic-autonomy-how-does-it-help-indias-security>, 访问日期:2025-06-12。

^② Barbara Lippert/Nicolae Onarza et al.,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ctors, Issue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pp. 5-7.

^③ Hans Mouritzen, “Between Polarity and Foreign Policy Freedom of Manoeuvre Is the Missing Link”, in Nina Græger et al. (eds.), *Pola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st, Present,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p. 101-125.

政策范式(如“规范性力量”)等同,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更准确地说,战略自主是驱动行为体不断调整其内外政策乃至重塑其国际角色的根本战略指引。

(二) 欧盟战略自主:始于战后重建的根本战略追求与目标

从战略自主本体来看,欧盟战略自主可以追溯到二战后初期。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源地,欧洲曾长期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丧失了引导历史前进的能力。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战争摧毁,美苏以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的姿态登上欧洲及世界政治舞台,并借助二战期间积累起来的实力优势迅速展开激烈的竞争,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上形成全面对峙的局面。欧洲由本洲群雄的角逐场变为美苏两国的必争之地。^①为应对生存危机、复兴经济并重塑国际影响力,欧洲各国开启联合自强的进程,通过一体化提高自身在美苏主导的东西方对抗中的自主应变能力。^②这一选择的深层逻辑,正是在不得不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前提下,尽可能找回并扩大集体行动的自主性,以应对大国威胁并避免沦为附庸。

早在20世纪50年代,“欧洲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就谈到了欧洲自主行动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提到了欧洲团结起来对抗“美国舆论”影响的责任。他表示:“建立共同体并非简单叠加理事会汇集的主权,我们要做的是创造一个真正的欧洲,使其能直面自身以及美国舆论,并对自身未来抱有坚定信心。”^③在防务自主领域,欧洲在一体化之初即确立了预防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和实现防务自主的目标。欧洲集体安全的保障源于在对美国的依赖和自主防务之间维系的脆弱平衡,因而一体化一直是欧洲追求安全和防务自主的手段,具体的尝试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和70年代的政治合作机制中。^④20世纪60—70年代,欧共体及成员国就已展开自上而下的、公开的、正式的讨论。在成员国层面,继时任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之后,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指出:“大西洋派追逐联邦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的前提即使在美国也是不存在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华盛顿的政治设计师和战略家对欧洲统一的支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是否真正愿意欧洲具有独立意志和能力、进行自主行动?”^⑤1972年10月,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欧洲共同体峰会后发表的讲话中也指出:“西欧不应该也不能够切断同美国的联系,然而,它也应当直言不讳地申明,它是作为一个新的实体

^① Cyril E. Black(ed.), *Rebir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48.

^② 房乐宪:《欧洲政治一体化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③ Jean Monnet, “Le mémorandum Monnet du 3 mai 1950”, *Politique étrangère*, Nr. 1, 1993, pp. 121-125, here pp. 121-122.

^④ 王振玲:《美国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认知与政策立场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5期,第24-44页,这里第26页。

^⑤ [德]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张连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4页。

存在的。”^①在欧共体层面，“欧洲特性”通过海牙峰会、《哥本哈根宣言》等逐步确立，并借助防务共同体计划、政治合作机制等一系列实践探索自主路径。以1969年海牙峰会上六位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呼吁建立一个“能够在未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团结的欧洲”为标志，^②欧共体开启了战略自主路径的探索。1972年12月，在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各国首脑明确提出要塑造欧洲共同体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欧洲特性”，希望在共同的价值与利益的基础上，更妥善地界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形成共同的立场，提高共同体的国际地位，以便在国际事务中担负更重要的角色。^③这一宣言标志着追求战略自主已超越欧共体成员国国家意志，上升为超国家层面的集体战略。

尽管欧盟官方依然没有给出关于战略自主的统一定义，但从战略自主的过程性和相对性看，欧盟战略自主并非静态目标或绝对的终极状态，而是动态赋能与赋权的实力建构过程。其本质在于整合物质与非物质资源、补齐能力短板，以应对能源、原材料、关键商品供应以及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等众多领域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从战略自主关系性来看，欧盟战略自主意味着在与外部行为体的依存关系中保持政策选择权与行动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脱钩，而是描述了其在追求和管理盟友与伙伴关系方面的自主能力。^④通过强化自主能力，欧盟得以在国际规则制定、危机应对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以欧洲的利益与价值观重塑国际秩序。

由此可见，欧盟战略自主具有清晰的本质：其一，战略自主是欧盟自二战后一体化进程开启以来一以贯之的根本战略目标与核心驱动力。其初始内涵是通过超国家联合，在经济、政治乃至安全领域逐步积累自主行动的能力与资本，最终成为能够主宰自身命运并塑造世界的强大实体。其二，欧盟战略自主体现为一个动态的、依赖特定条件的实践过程，其实现路径并非单一固定，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实践形态。

（三）欧盟战略自主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民事—规范性—地缘政治”的实践演进

基于战略自主作为根本目标与动态过程的基本属性，我们可清晰辨识欧盟在追求战略自主过程中呈现出的阶段性演进特征。这一演进外化为三种内在连续性的主导实践形态：“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与“地缘政治力量”。

^① [美]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刘丽媛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② “Communique of Conference of the Heads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e Hague, December 2, 1969, in Christopher Hill/Karen E. Smith (eds.),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Key Docu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48.

^③ 陈志敏、古斯塔夫·盖拉茨：《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④ Pauli Järvenpää/Claudia Major/Sven Sakkov,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operationalising a buzzword”, Tallin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ICDS)*, October 28, 2019, p. 12, <https://icds.ee/en/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operationalising-a-buzzword/>, 访问日期:2025-05-04.

具体而言,“民事力量”是指一种不依赖军事力量、通过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民主准则等影响他者乃至国际体系的能力。^①“规范性力量”关注欧盟的规范性本体,强调欧洲力量主要源于欧洲规范的制定和输出,将欧盟视为通过传播规范承担标准和规范的设定者的角色,从而赋予欧盟不同于其他国际力量的新的身份特征。这种定位并不关注欧盟的制度或政策等经验性层面,而是将认知过程纳入分析之中。^②“地缘政治力量”体现为一种以安全稳定为首要目标和战略考量,以地理环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经济或军事力量等物质要素来界定权力和利益,从大国、势力范围和更大的政治空间(欧亚大陆、中东、西方等)来解释国家行为、战争和联盟的世界观与行为逻辑。^③这三种实践形态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且动态的自主光谱,用以理解欧盟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选择与行为逻辑。这种“目标-形态”的辩证关系,为下文构建行为体实力、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关系契合度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清晰的概念基础与历史依据。

三、欧盟战略自主的分析框架

基于对欧盟战略自主本质与历史缘起的分析,本文借鉴现实主义经典理论,构建一个“行为体实力-国际体系压力-盟友关系契合度”三维分析框架,并将“赋能/赋权”作为实力动态建构的内在机制,旨在为理解欧盟战略自主这一长时段、多形态的演进过程,提供一个更具动态性、实践导向和解释力的分析工具。其中,“行为体实力”是决定性力量,以“赋能”与“赋权”为内在变化机制,其动态变化不仅构成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内在基础,同时也对外部国际体系结构与同盟关系产生深刻的塑造作用。“国际体系压力”,特别是体系权力结构以及行为体对自身在结构中的地位的认知,是欧盟战略选择的前提条件和结构性因素。它不仅决定了欧盟战略的性质是竞争性还是合作

① François Duchêne, “Europe’s Role in World Peace”, in Richard Mayne (ed.), *Europe Tomorrow: Sixteen Europeans Look Ahead*, London: Fontana, 1972, pp. 32–37; François Duchêne,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Interdependence”, in Max Kohnstamm/Wolfgang Hager (eds.), *A Nation Writ Large? Foreign-Policy Problems Before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73, pp. 19–20; Romano Prodi, “2000–2005 Shaping the New Europe — Speech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Strasbourg, 15 February 2000, http://ec.europa.eu/comm/off/work/index_en.htm, 访问日期:2025–03–03;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2, 2002, pp. 236–237; Hanns Maull, “Germany and Japan: the New Civilian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5, 1990, pp. 91–106, here pp. 92–93; Christopher Hill,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Power Bloc, Civilian Model or Flop?”, in Reinhard Rummel/Vera Erdmann-Keefer (eds.), *The Evolu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Actor: Western Europe’s New Assertiveness*,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 31–55, here pp. 31–33.

② Richard G. Whitman, “The Neo-Normative Turn in Theorising the EU’s International Prese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48, No. 2, 2013, pp. 171–193;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p. 238.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2003–12–12, <https://europa.eu/globalstrategy/en/European-security-strategy-secure-europe-better-world>, 访问日期:2025–05–12。

性,也是塑造行为体能力指向的关键因素。“盟友关系契合度”(主要指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密性与可靠性)则作为关键调节变量,对战略自主的进程起着重要的加速或迟滞的作用。三者交互作用,共同揭示了欧盟战略自主从“民事力量”到“规范性力量”、再向“地缘政治力量”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 核心驱动:行为体实力的动态建构

行为体实力是战略自主赖以实现的基石,其强弱决定了战略自主的广度、深度与最终形态。一般意义上,行为体实力越弱,其战略自主性也越弱。但伴随着行为体实力的提升,其塑造国际体系与实施战略自主的意愿与能力也会增强,长期来看更是如此。而关于什么是国家实力,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特别是在国家实力构成要素的认知上,仍存在分歧。一般而言,国家实力(National Power)是指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等方面的综合能力。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发展,国家实力的构成要素也在不断变化中,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实力评估模型。^① 传统分析常将“实力”视为静态的解释变量,本文则将“赋能”与“赋权”这一对通常用于公共政策、组织社会学或治理研究的过程性概念,系统地引入对欧盟这一特殊行为体“实力”的动态分析中,认为行为体实力本身是一个通过持续的政治实践而不断被建构、转化和重塑的动态过程。

赋能,^②即能力的生成与累积,是指行为体在经济、军事、科技、制度等维度上,对实质性资源与能力进行系统性整合与强化的过程。对欧盟而言,赋能始于二战后对经济资源的整合(如关税同盟、统一市场),并以“同心圆”模式不断向外扩展,逐步将分散的成员国资源转化为集体性的战略能力。赋能回答的是“凭借什么实现自主”这一根本问题。从冷战时期“民事力量”阶段专注于经济赋能,到冷战后初期“规范性力量”阶段强化规则制定能力赋能,再到当前“地缘政治力量”阶段强调防务与科技、数字赋能等,赋能领域的拓展正是欧盟实力结构演进的直接体现。赋权,^③是能力与实力的转化与生效。它将不断累积的能力与资源外化为对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主导权与话语权。制度和秩序发挥指导作用的过程与结果就是赋权,^④这是一个使能力“生效”的政治过程。对欧盟而言,赋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对内通过构建超国家机构(如欧盟委

^① 胡键:《基于大数据的国家实力:内涵及其评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83-192页,这里第184-185页。

^② European Union,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For a European Union that protects its citizens,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contribute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Brussels, 2022-03-21, p. 47,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371-2022-INIT/en/pdf>, 访问日期:2025-03-03。

^③ John Friedmann, *Empowerment: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p. 100-105.

^④ 权力与权威都是一种关系的概念,产生于自我和他者的互动中。权力是行为体实力与能力强化的结果。权力随实力的增长而增长,权力的增长会改变国家的自我认知、对行为体利益与地位的界定以及对他的期待。权威是一种合法化的权力,与行为体在秩序中的地位承认及情感有关。

员会、欧洲法院)形成“契约型权威”,^①确保集体意志转化为有约束力的共同政策;对外通过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平台等将内部能力外化为影响国际规则(如数据标准)、设置议程(如气候变化)或施加成本(如制裁)的权力,其权威形态呈现出从“精神-契约型”向更具强制性的“支配型”混合演进的特征;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则体现为寻求从“美主欧从”的依附型权威向更平等的契约型权威转型。赋权解决的是“能力如何转化为权力与影响力”的问题,是行为体实力实现其战略价值的关键一环。

赋能与赋权构成一个自我强化的驱动系统,能力建设为权威构建提供物质基石,而权威的巩固又为深化能力建设、吸引更多资源创造政治条件与合法性。欧盟战略自主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其通过政治实践与制度创新,不断进行赋能与赋权,从而动态建构和重塑自身实力的过程。

(二) 外部塑造: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关系契合度

“赋能-赋权”这一内在驱动过程的方向、优先级与强度,受到“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关系契合度”这两大外部变量的系统性塑造。

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单极、两极、多极)以及国家间互动方式(竞争/合作),为行为体划定了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与战略可能性边界(如图1)。如果互动是以竞争和敌对为主,压力则表现为生存性威胁;如果互动是以契约和合作为主,压力则转化为制度约束。一般意义上,当国际社会存在两个或者多个势均力敌的大国或集团,并在观念、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时,安全困境便随之而生。在此背景下,大国竞争超越合作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防范和遏制成为主导国家的首选行为,形成所谓竞争性国际体系,特别是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出现一方力量上升而另一方力量相对下降的背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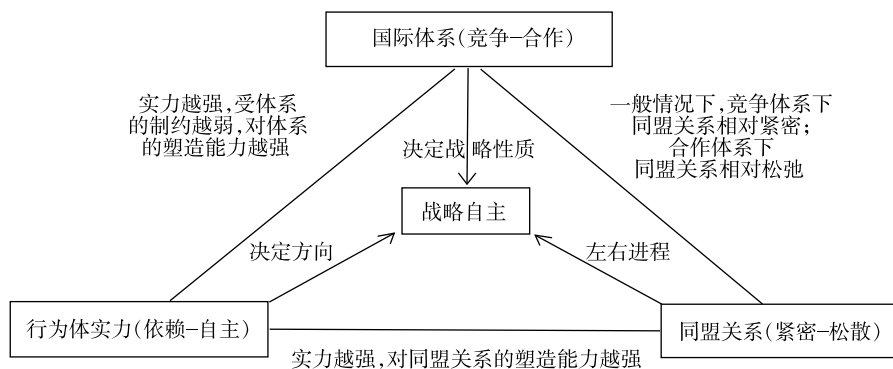


图1 欧洲战略自主演进机制

来源:作者自制。

^① Jorg Kustermans/Rikkert Horemans, “Four Conceptions of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6, No. 1, Winter 2022, pp. 204-228, here p. 210.

在竞争性国际体系中，体系主导者为应对共同对手，往往倾向于通过扶持盟友来整合力量、巩固阵营。这种结构性压力迫使实力相对较弱的行为体倾向于选择“搭便车”或“追随”策略，以获取安全保障与战略空间。比较典型的是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成为主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其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具有明显的两极地缘战略对抗和意识形态分裂的特点。^①两国对盟友国家采取拉拢、扶持政策，以增强同盟整体实力；对非盟友国家则奉行“实力原则”，通过遏制、直接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解决冲突。两极对峙格局始终孕育着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可能。美苏关系的紧张与缓和直接影响欧共体对外战略的性质、手段与方式。在美苏两极紧张对峙的战略环境下，生存威胁压缩了行为体的战略选项。行为体若实力不足以独立应对安全威胁，即战略自主的收益无法抵消暴露于美苏对抗所面临的风险，其往往会采取规避风险的策略，避免在军事等高危领域与美国竞争或刺激苏联，从而将战略重心转向低风险、高收益的经济领域，以此积蓄实力。

当国际社会出现合作性国际体系，即大国合作超越竞争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时，同盟关系相较于竞争性国际体系时期更为松散，行为体战略自主的空间也相对较大。如冷战后初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的确立和发展建立在美国单极霸权的主导性作用和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制度性安排的基础之上。欧美等西方国家对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普世性，以及西方力量优越性的乐观憧憬达到顶峰。^②美国的主导作用和绝对优势导致安全困境的条件不复存在，安全议程与军事力量在国际社会和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暂时让位于经济与政治，和平与合作取代对峙与竞争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形态。在这一战略环境下，生存威胁的缓解和共同敌人的缺位，拓宽了行为体的战略选择空间，同时也使既有的同盟关系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弹性松动。得益于长期的制度嵌入与利益交织，盟友间的联结总体上维持着可靠性，体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然而，对那些历史上曾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体而言，若其自身实力持续增强且对发展前景抱有乐观预期，则其追求战略自主的意愿与能力会显著提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欧盟在维护、变革世界和欧洲地区秩序方面有更为明确的主张和设想，对于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身份角色，以及力量运用的手段和方式也有更为清晰的定位。^③

^① 朱峰：《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为什么忧虑》，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 年第 6 期，第 18-30 页，这里第 19 页。

^② 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文中指出，自由民主既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可能构成“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主义再也不存在有力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 页。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力得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12 页。

^③ 赵光锐：《欧盟与国际秩序变革：观念、角色与挑战》，载《南大亚太评论》，2018 年第 1 期，第 188-245 页，这里第 190 页。

相比之下,当前国际体系呈现竞争与合作深度交织的复杂形态。一方面,大国间战略博弈持续加剧,在某些领域(如科技、规则、区域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另一方面,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经济稳定)又要求大国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合作。在此背景下,欧盟面临一种结构性困境:其相对实力有所弱化,导致其在安全防务、经济稳定等领域对盟友美国的依赖性在客观上有所上升,这在应对美国单边关税压力及处理俄乌冲突等危机时表现尤为明显。然而,恰恰在同一时期,欧美盟友关系的契合度显著下滑,战略互信面临严峻挑战。这种“依赖加深”与“信任减退”之间的张力,强化了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紧迫感,促使其以更大决心、更系统性地推进能力建设。这一进程本质上是由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可靠性下降的双重驱动所塑造,标志着欧盟在变局中主动构建自主性的战略转向。

由此可见,欧盟战略自主的演进逻辑并非简单的政策线性更替,而是其通过“赋能-赋权”不断动态建构实力,并在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关系的持续互动与塑造下,适应性地呈现为不同主导形态的历史过程。在特定历史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关系契合度的特定组合,共同构成一个外部“战略性约束-机会选择”结构。这一结构深刻塑造行为体对自身实力状况的认知,进而引导其“赋能-赋权”实践的资源配置与路径选择。随着实力尤其是经济与制度资本的积累,行为体不再满足于既定体系下的从属角色,而是寻求增强自身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和安全架构中的话语权,从而推动国际体系力量对比与互动模式的渐进调整。与此同时,实力的增长也会改变行为体与盟友之间的依赖对称性,促使其重新审视同盟内的权责分配并就此进行谈判,推动同盟关系从“依赖-保护”向更为均衡的“协作-协商”形态演变。因此,实力变迁既是行为体应对国际体系压力与同盟约束的结果,也是其主动重塑外部战略环境的关键变量。

四、欧盟战略自主的演进逻辑与实践形态

基于前文构建的三维分析框架,本部分系统考察欧盟战略自主的三种主导形态,即“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和“地缘政治力量”,揭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通过赋能与赋权回应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实现战略自主的动态演进。其中,“民事力量”形成于“高压体系+紧密盟友”条件下,聚焦经济赋能与内部契约赋权的实力建构;“规范性力量”形成于“宽松体系+可靠盟友”条件下,聚焦规则赋能与全球规范赋权的实力建构;“地缘政治力量”则形成于“高压竞合体系+盟友动摇”条件下,致力于全维度赋能及多元化赋权的实力建构。

(一)“民事力量”:欧盟战略自主的奠基阶段

欧盟战略自主的起点建立在对经济实力的系统积累之上,其核心逻辑体现为运用非军事手段扩大内外影响力,以此提升潜在的战略选择空间——这一形态被概括为“民事力量”。“民事力量”这一概念是学界对二战后欧共体政策实践的高度概括。它既是欧共体探索“欧洲特性”的初步尝试,也是欧共体在国际事务中趋向于中立的基本

立场,更是欧盟对如何更多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的思考。在体系高压与自身实力不足的历史条件下,“民事力量”是欧盟为实现其根本自主目标所采取的最具现实可行性的生存与发展策略。

首先,从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关系来看,“民事力量”是美苏两极高压对峙格局下欧洲的必然选择。二战结束后,美苏全面对抗形成高度紧张的竞争性国际体系,西欧国家在冷战格局中被“边缘化”,处于两大阵营的夹缝之中。面对生存威胁的严峻考验与自主能力的严重不足,欧洲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联合一致并且同美国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对付“共产主义威胁”。欧洲不仅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更需要军事援助,因为只有美国才能提供抗衡苏联的力量。因此,欧洲一方面“邀请”美国以联手抗衡苏联集团,另一方面致力于维护自身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利益。美国也越发意识到介入欧洲事务的紧迫性,担心西欧的经济混乱将会给“共产主义的渗透”提供机会,进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生存,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并迫使美国采取一种代价高昂的重新武装和军事备战的政策。^①在此背景之下,美国酝酿出台“马歇尔计划”,旨在帮助欧洲盟国恢复因二战而遭受毁坏的经济,同时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进一步扩张,^②为欧洲提供经济复兴援助,并通过北约提供安全保障。

其次,从实力建构与实践路径来看,欧盟战略自主以经济赋能为根本逻辑。在冷战高压环境下,发展经济、依托“民事力量”被视为实现战略自主的唯一可行途径,任何军事行动都须慎之又慎,因为其往往被认为具有挑衅性和霸权色彩,甚至可能引发毁灭性灾难。历史经验也表明,霸权地位往往根植于经济控制权。^③这一时期,欧共同体着力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建立关税同盟(1958年)、实施共同农业政策(1962年)、建设统一市场(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等措施,系统性地整合成员国分散的经济资源,逐步形成集体性经济竞争力与市场规模优势。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生效,这进一步增强了欧共同体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与对外经济自主性。^④这一系列经济赋能举措,旨在实现战后复苏、减少对美经济依赖,并为自主行动积累最初的物质资本。事实上,在冷战期间,欧共同体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着欧洲从二战后的一片废墟走向“世界一极”,从全面依附美国到与美国平起平坐并联手制定了全球市场80%的

^① Melvyn P. Leffit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h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63.

^② 赵怀普:《当代美欧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③ [美]科林·弗林特、[英]皮特·泰勒:《政治地理学:世界-经济、民族-国家与地方》,刘云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6-97页;孟庆龙:《大国兴衰与更替的密码——〈大国的兴衰〉揭示的世纪性规律》,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16期,第94-97页,这里第95-96页。

^④ 惠一鸣:《欧洲联盟发展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586页。

国际规制和标准,形成事实上的G2管理结构。^①在赋权方面,欧共体对内构建“契约型权威”,通过设立超国家机构(如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并推动《罗马条约》等法律框架的落实,将成员国部分主权让渡制度化,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共同决策与政策执行机制。到20世纪末,超过80%的经济社会决策是在欧洲层面作出的。^②这种内部权威的建立,确保了经济一体化的成果能够转化为可持续的集体行动能力,为后续的自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民事力量”是欧共体在冷战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追求战略自主而采取的“避险”与“蓄力”策略。这一概念不仅描述了一个避免依赖军事手段的国际行为体,更蕴含了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特殊路径与治理哲学。它以经济赋能为物质起点,以内部契约赋权为制度保障,在借助美国安全保护的同时,为欧盟更深层次的自主实践积累了关键的物质资本与制度经验。“民事力量”的概念化,本质上是对欧盟早期政策实践的战略概括与身份建构,为其后续向“规范性力量”“地缘政治力量”的演进提供了历史与逻辑起点。

(二)“规范性力量”:欧盟战略自主的拓展阶段

随着冷战的终结,国际体系与盟友关系发生深刻调整,欧盟战略自主进入以“规范性力量”为主导形态的拓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欧盟依托其积累的经济与制度资本、冷战后单极体系提供的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跨大西洋盟友关系的持续支持,逐步转向以规则和价值观输出为核心的“规范性力量”,以此拓展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制度性权威。

首先,从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关系来看,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为欧盟施展规范性影响力提供了结构性条件。两极紧张对峙格局的瓦解使国际社会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模式。欧美等西方国家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取得了全面胜利。1991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在“世界新秩序”演讲中宣称:“世界各国都能实现和谐共处……法治将取代丛林法则。”^③在这一体系下,安全威胁相对缓和,军事对抗让位于规则与制度竞争。欧盟的生存环境和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核心力量之一。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欧盟实现了在国际贸易体制中与美国平起平坐。正如时任法国部长级代表阿兰·拉马苏尔(Alain Lamassoure)于1994年4月17日在关贸总协定第八轮谈判中所言:

^① 1958—1970年,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1970—1978年,欧共体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61%,同期美国为2.79%,欧共体高于美国。1983—1990年,欧共体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2.5%、2.4%、2.6%、2.5%、4.2%、3.9%、3.4%,参见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页。

^② 戴炳然:《对欧洲一体化历史进程的再认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的一些思索》,载《欧洲研究》,2017年第1期,第70—79页,这里第73页。

^③ George Bush,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29, 1991,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H. W. Bush, 1991, Book I*,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 90.

“这是自 1947 年以来第一次，欧盟作为一个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力量。”^①这一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欧盟实力的增长，为其扩大战略自主并以“规范性力量”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战略空间和机遇。

与此同时，跨大西洋关系在冷战后初期仍保持较高的稳定性。美国仍将欧洲视为关乎其战略利益的首要地区，将北约视为保持其在欧洲影响的主要工具，并且试图通过扩大北约来填补冷战后在东欧地区出现的政治和安全真空。^② 欧洲也意识到自身离不开美国，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巴尔干等地区爆发了严重的种族冲突，并引发了难民潮，进一步增加了欧洲形势的不确定性，使欧洲再度面临不稳定的风险。因此，欧美双方保持了总体上的政治合作，并在争夺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博弈中达成了妥协性安排。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并行推进，美国在安全上仍为欧洲提供保障，欧盟则得以将战略重心从生存安全转向规范塑造。双方在推广西方价值观、推进全球自由经济秩序方面目标一致，这为欧盟“规范性力量”的施展提供了关键外部支持。

其次，从实力构建与实践路径来看，欧盟实现了从经济赋能向规范赋权的战略升级。这一时期，欧盟坚信“信奉人权的国际标准、接受政治自由化”是社会和政治长期稳定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欧盟不仅以“规范性力量”界定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和角色，而且以向世界推行这些规范和价值观为职责和目标。^③ 其核心是通过内部一体化深化与外部规范性扩张，将制度资本转化为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与议程设置能力，塑造欧盟这一当代独特的政治实体的新道德形象，将欧盟打造成未来世界秩序的典范。一方面，欧盟通过深化内部一体化巩固其制度资本，如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 年)确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框架，通过《里斯本条约》(2009 年)将民主、法治和人权明确定义为欧盟对外行动的核心原则，为其规范性角色提供了宪制基础。另一方面，欧盟通过系统性的规范扩散机制将内部制度优势转化为外部影响力：一是以“哥本哈根入盟标准”为核心，将民主、法治等政治条件制度化，借助东扩进程将中东欧国家纳入其规范体系；二是通过“欧洲邻国政策”等工具，以条件性援助与制度对接等方式向周边地区推广其规则与价值观，并通过区域间合作向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推广其价值规范与区域一体化经验；三是在全球多边场合积极倡导基于欧洲规范的议程，如气候变化、人权保护^④等。至此，

^① “Interviews de M. Alain Lamassoure, ministre chargé des affaires européennes, dans Le Figaro le 27 avril 1994, La Vie le 5 mai et Profession politique le 6 mai, sur l'Europe après Maastricht, les élections européennes, la stabilité en Europe et la révision des institutions communautaires”, April 27, 1994, <https://www.vie-publique.fr/discours/214775-alain-lamassoure-27041994-le-figaro-la-vie-profession-politique-leurope>, 访问日期:2025-12-23。

^② Ronald D. Asmus, *Opening NATO's Door: How the Alliance Remade Itself for a New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5-178.

^③ 洪邮生:《“规范性力量欧洲”与欧盟对华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1 期,第 52-65 页,这里第 57 页。

^④ 解楠楠、喻扬:《欧盟人权外交的历史脉络、现有机制与实施路径》,载《人权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120-140 页,这里第 125-126 页。

欧盟逐步建立起以规范塑造为核心的国际权威形态,其影响力不仅源于经济实力,更立足于其作为“规则制定者”与“规范倡导者”的角色认同。

“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超越了欧洲范围,在东亚、非洲、拉美等地产生了示范效应。这标志着欧盟从追求经济自主升级为追求规则自主,从区域一体化实体发展为全球规范倡导者,为其后续向“地缘政治力量”形态演进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三)“地缘政治力量”:欧盟战略自主的重塑阶段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欧盟战略自主进入以“地缘政治力量”为主导形态的重塑阶段。面对国际权力转移、大国博弈加剧、周边安全危机与内部多重挑战的交织,欧盟开始从“规则塑造者”向“权力博弈者”转型,推动战略自主从侧重规范与制度影响的“软性自主”,转向强调安全防务、经济主权与技术竞争的“复合型自主”。“地缘政治力量”是欧盟对“民事力量”和“规范性力量”定位的补充和修正,意味着欧盟努力争取更多的战略自主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同时也推动一体化不断深化和扩大。^①这一阶段的演进,标志着欧盟在变动的国际体系中为维护自身地位与利益作出的根本性战略调整。

首先,从国际体系压力与盟友关系来看,国际权力结构的多极化趋势和大国竞争的回归构成了“地缘政治欧洲”兴起的结构性背景。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称的“第三次权力转移”正在重塑全球格局,新兴力量崛起冲击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②欧盟明确意识到,国际体系正从单极结构向更分散的权力分配转移,而这一进程并未带来更多合作,反而加剧了竞争与不确定性。^③尤其是俄乌冲突引发的系统性冲击打破了传统“规范输出”模式的可持续性,迫使欧盟接受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2019年,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将自身界定为“地缘政治委员会”,明确了其成为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诉求,并在多个场合从不同的视角重申和贯彻地缘政治的理念与主张,^④展现出“地缘政治委员会”的自信与抱负。一系列国际危机和欧洲危机的出现,使谋求地缘政治权力成为欧盟国家的普遍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盟友关系也出现深刻嬗变。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单边主义倾向以及跨大西洋信任危机,促使欧盟重新评估自身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特别是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从根本上打破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多伙伴世界”中“更新美国领导地位”的更具包容性的设想。^⑤

^① 解楠楠:《地缘政治欧洲:欧盟的新理念与政治趋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8页。

^②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the Rest”, 2008-05-12, <https://fareedzakaria.com/columns/2008/05/12/the-rise-of-the-rest>, 访问日期:2025-11-21。

^③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EEAS), “The European Union’s Global Strategy: Three Years On, Looking Forward”, Brussels, 2019, p. 8, <https://www.wita.org/atp-research/eu-global-strategy/>, 访问日期:2025-12-23。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发挥领导力》,2019-11-21,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911/20191102915555.shtml>, 访问日期:2025-05-12。

^⑤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2007, pp. 2-16.

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不考虑国际准则和政治传统，否定自由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础，公开质疑欧盟，支持英国脱欧，并强烈要求欧盟更多地分担军费和减少对美贸易顺差。^①这使得跨大西洋关系处于紧张状态，面临范式转变的危机。尽管北约仍是欧洲安全的基石，但欧盟不再满足于扮演“初级伙伴”角色，而是寻求在相互依赖中建立更为对称的跨大西洋关系，强调“增强对美国的自主权和根据国际环境采取行动的能力”^②。

其次，从实力构建与实践路径来看，欧盟在此阶段重点推进硬实力赋能与复合型赋权，旨在弥补传统“民事力量”与“规范性力量”的短板，构建地缘政治行动能力。

在赋能方面，欧盟显著强化安全防务、经济主权与科技竞争力两大支柱。一是安全防务赋能。俄乌冲突的爆发以最直接的方式宣告欧洲“后冷战和平”的终结。随着传统领土安全威胁的回归，欧盟将加强防务自主从长期愿景转变为刻不容缓的行动议程。2016年欧洲防务计划(EDAP)出台、2017年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生效、2021年欧洲防务基金(EDF)设立、2022年《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发布，以及2024首份《欧洲防务产业战略》(EDIS)和2025年首份《欧洲防务白皮书》相继问世，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欧盟在防务领域力求提升自主性、减少外部依赖、增强危机管理能力的战略考量。^③二是经济与科技赋能。经济与科技是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核心载体。面对全球供应链安全与科技竞争压力，欧盟推出“开放的战略自主”框架，强调在维护经济开放的同时降低关键领域的战略性依赖。为此，欧盟将“强韧性”和“去风险”作为实现经济自主的战略框架，将内部能力提升和外部市场多元拓展作为实现经济自主的战略举措。一方面，欧盟增强了对关键供应链(如芯片、药品、电池材料)、关键基础设施(如数字、能源)和关键技术标准(如AI、数据)的控制能力，因为这不再仅仅关乎竞争力，更关乎经济主权。为此，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自2019年上任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构建“经济主权”和“技术主权”的政策文件。另一方面，欧盟通过研发税收激励、战略项目资助等政策工具组合，提高面向未来的新技术与新产业的竞争力，旨在系统性地提升欧盟在新兴技术产业化阶段的制度性话语权，从根本上稳固和

^① Alexandra de Hoop Scheffer/Martin Quencez, “Transatlantic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2020”, 2019-03-25, <https://www.gmfus.org/publications/transatlantic-security-cooperation-toward-2020>, 访问日期:2025-11-21; Richard Haas, “How a World Order Ends and What Comes in its Wake”, 2018-12-1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12-11/how-world-order-ends>, 访问日期:2025-05-12。

^② Charles Michel, “A Stronger and More Autonomous European Union Powering a Fairer World”, 2020-09-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09/25/a-stronger-and-more-autonomous-european-union-powering-a-fairer-world-speech-by-president-charles-michel-at-the-un-general-assembly/>, 访问日期:2025-05-12; “Recovery Plan: Powering Europe’s Strategic Autonomy — Speech by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at the Brussels Economic Forum”。

^③ 严少华：《欧洲战略自主：从迷思走向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37页。

增强欧盟在技术-产业-标准的全球竞争格局中的比较优势,^①并通过《欧洲芯片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等产业政策工具,着力构建本土供应链韧性,等等。

在赋权方面,欧盟着力构建“支配型权威”,通过制度创新与政治动员强化内外行动能力。一是对内情感与契约型权威并重。欧盟高层频繁使用“被边缘化”“沦为竞技场”等地缘政治话语进行政治动员,塑造成员国共同威胁认知与战略文化;^②同时通过设立欧洲防务基金、军事计划与行动能力机制等超国家架构,逐步将安全防务权能制度化。二是对外强化区域支配与规则塑造。在周边地缘布局上,欧盟将西巴尔干等区域视为“战略缓冲区”,通过新版西巴尔干扩大政策^③与邻国政策(如《欧盟及其邻国:共同应对安全挑战》)强化影响力,并明确要求相关国家妥善应对“第三国不良影响”。^④在全球层面,欧盟一方面对外更强势地推广欧洲的监管标准,如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数字市场法》(DMA),并将其作为塑造全球规则、彰显独立身份的地缘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借助贸易救济工具、投资审查机制等经济治理手段,将市场力量转化为地缘政治杠杆。

作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概念,“地缘政治力量”使欧盟在自我定位上不再满足于规范性输出,而是逐步将自身构建为既能推广价值又能在国际政治中维护自身利益、确保安全的全球行为体。欧盟决策者认为,制定标准将是确保欧盟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进行持续性竞争与获得先发优势的关键。^⑤欧盟从“规范性力量”到“地缘政治力量”的转变并非范式替代,而是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回归等多重危机下欧盟重构其自主性的战略调试,其政策实践呈现“规范性为体,地缘性为用”^⑥的混合特征。

综上,战略自主并非一个单一、固化或静止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持续受到内外挑战影响的动态演进过程。它既是欧盟的核心政策话语,也反映了其在多极世界中争取成为更强大、更独立行为体的长远雄心。这一进程深受欧盟实力约束、国际格局剧变及跨大西洋关系影响,并推动欧盟从传统的“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向更具现实行动

① 解楠楠、吴雨晴:《欧盟对华“去风险”战略逻辑、趋向及限度》,载《德国研究》,2025年第1期,第4-25页,这里第9页。

② Jean Claude Juncker, “State of the Union 2018: the Hour of European Sovereignty”, 2018-1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news/state-union-2018-hour-european-sovereignty-2018-sep-12_en, 访问日期:2025-11-12; Christoph O. Meyer, “Convergence towards a European Strategic Culture? A Constructivist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Changing Norm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4, 2005, pp. 523-549.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Enhancing the Accession Process — a Credible EU Perspective for the Western Balkans”, 2020-02-05, 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sites/near/files/enlargement-methodology_en.pdf, 访问日期:2025-11-12。

④ European Communication, “A credible enlargement perspective for and enhanced EU engagement with the Western Balkans”, Strasbourg, 2018, COM(2018) 65 final, p. 2, https://enlargement.ec.europa.eu/credible-enlargement-perspective-and-enhanced-eu-engagement-western-balkans-0_en, 访问日期:2025-11-12。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Strategic Foresight Report: Twinning the Green and Digital Transitions in the New Geopolitical Context”, 2022-06-2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2DC0289>, 访问日期:2025-11-12。

⑥ 严少华:《欧洲战略自主:从迷思走向现实?》,第137页。

能力的“地缘政治力量”转型。

五、欧盟战略自主的未来前景

第四部分系统考察了欧盟战略自主从“民事力量”到“地缘政治力量”的历史演进，揭示了其作为动态权力建构过程的内在逻辑。然而，历史解释的目的在于为前瞻研判提供学理基础。当前，以“地缘政治力量”为主导形态的欧盟战略自主已进入深度调适期，其未来走向并非线性的自主强化，而将深受前文所述三大核心变量的持续影响与结构性制约，特别是不断加剧的国际体系高压与欧美盟友关系的质变，正构成前所未有的双重外部约束。在这一结构性张力下，欧盟战略自主进程深陷自主雄心与结构性依赖的内在矛盾中，其未来前景注定是一条在有限空间内进行艰难调适、探索的过程。

（一）外部环境双重挤压：体系高压持续深化与盟友关系深刻调整

当前国际格局深度重构与大国间“竞合博弈”常态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欧盟构成系统性挑战。与此同时，跨大西洋关系正经历从价值共同体向利益交易场的结构性质变。这种“体系高压持续”与“盟友可靠性下降”的同步强化，从正反两个维度加剧了欧盟战略自主的现实紧迫感与内生动力。

一是国际体系结构性高压持续强化。当前国际格局演变走向重要分水岭，单极霸权秩序渐失人心，多极化结构加速重组。百年变局下，新旧矛盾交织迸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关税战冲击多边贸易体系，全球产业链面临开放与封闭的战略岔路；地区冲突频率创二战以来新高，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外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受到严峻挑战。^① 特别是特朗普再度执政所推行的“美国优先 2.0”政策，正从多个维度对国际体系产生系统性冲击。如在经贸领域，其以单边关税为武器、^②以产业补贴为壁垒，持续瓦解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秩序；在数字技术领域，其以“星际之门”计划、加密货币政策、数字贸易新规和网络安全政策为支柱，推进技术主导、金融控制、规则霸权与联盟捆绑，全面强化全球数字空间的控制与排他性联盟构建；^③在能源资源领域，其以立法固化传统能源、以供应链武器化切割绿色市场，通过《大而美法案》系统绞杀清

^① 王毅：《在历史演进重大关头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在 2025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5-12-30，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512/t20251230_11790367.shtml，访问日期：2026-01-11。

^②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Declares National Emergency to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 Edge,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Strengthen our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2025-04-02,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4/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declares-national-emergency-to-increase-ourcompetitive-edge-protect-our-sovereignty-and-strengthen-our-national-and-economic-security/>, 访问日期：2025-12-11；White House, “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 2025-01-20,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america-first-trade-policy/>, 访问日期：2026-01-11。

^③ 冯钧泽：《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美国强化全球数字空间霸权的策略》，载《美国研究》，2026 年第 1 期，第 69-94 页，这里第 76-83 页；PR Newswire Association LLC, “Global Tech Alliance Launches Stargate UAE”, *The Korea Herald*, 2025-05-23, <https://m.koreaherald.com/article/10493730>，访问日期：2026-01-11。

洁能源、精准扶持化石燃料,并以“友岸外包”方式重构关键矿产与绿色技术壁垒,推动全球产供应链朝向阵营化、政治化方向加速割据,^①等等。

二是欧美关系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信任衰减与角色重构。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奉行“经济安全本体化”与“交易型单边主义”的对外战略,将对欧关系从强调共同价值的伙伴关系异化为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交易契约。在经济上,特朗普以关税为工具重置美欧贸易平衡,冲击欧盟生产型经济体系。在安全防务上,其以欧美地缘距离而非大西洋安全整体性的传统战略认知,界定欧美安全相关性,停止在欧洲常规威慑上承担首要责任,转而依托延伸核威慑履行对欧安全承诺。^②在俄乌冲突的解决上,特朗普试图回归美俄大国政治模式,将欧洲和乌克兰安全立场与诉求边缘化。在援乌问题上,其将美国经济收益和政治利益置于欧洲安全诉求之上,反复利用议题联系策略向欧洲转移援乌责任。^③与之相伴的是,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欧盟安全承诺的明码标价,通过“海牙承诺”等机制,将北约军费标准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并公开批评欧洲“文明消亡”,明确支持其内部右翼民粹势力,企图重塑一个符合美国战略叙事的欧洲。^④特朗普将贸易与科技武器化、调整安全承诺、发表对欧洲文明的贬损性论述以及干涉欧洲内政的行为,一方面使欧盟意识到其繁荣所依赖的全球供应链可能成为战略软肋,迫使欧洲通过填补常规军力、军工产能和指挥体系的短板来减少对北约的路径依赖;^⑤另一方面直接冲击了欧盟战略自主的深层根基——自主定义其利益、身份与价值观的能力,刺痛了欧洲作为古老文明和现代“规范性力量”的自尊。

综上,国际体系的对抗性升级与跨大西洋盟友关系的信任衰减相互叠加、同频共振,使欧盟战略自主的外部环境呈现出“双重挤压”的结构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强化了欧盟自主的共识,也使其战略自主进程始终处于外部危机驱动与内部能力建设相互拉扯的动态之中。

(二) 内部制约:实力建构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欧盟战略自主的内在张力根植于其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实力建构过程中面临的多重结构性约束。这些约束制约着欧盟战略自主的深化,是其长期陷于“自主雄心”与“依赖现实”悖论的内生性根源。

^① “An act to provide for reconciliation pursuant to title II of H. Con. Res. 14”, 2025-07-04, Sec. 5010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9th-congress/house-bill/1>, 访问日期:2026-01-11。

^② Will Jessett, “US Defence Policy And Planning: What To Expect Next?”, RUSI, 2025-05-16,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us-defence-policy-and-planning-what-expect-next>, 访问日期:2026-01-12。

^③ 卓华、王明进:《特朗普冲击下的欧盟对美战略调适》,载《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10期,第28-51页,这里第30-33页。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5-12-0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访问日期:2026-01-12。

^⑤ 张雪儿、房乐宪:《欧洲视角下的欧美关系:不确定性及再适应》,载《国际论坛》,2025年第5期,第40-58页,这里第42-43页。

一是选择性赋能与结构性依赖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安全防务自主领域，尽管永久结构性合作与欧洲防务基金等机制标志着防务一体化的制度性进展，2025年《欧洲再武装计划》与《防务白皮书：战备2030》更展现出通过单一市场机制振兴欧洲防务工业、减少对美依赖的雄心，^①但欧盟在核威慑、战略情报、高端指挥体系及关键军事技术等核心安全领域，仍深度嵌套于以北约为核心、由美国主导的安全供给体系之中。这种依赖不仅体现在能力层面，更通过政治与制度安排得以固化。以2025年6月在北约海牙峰会上达成的协议为例，欧洲成员国为确保美国对集体防御的承诺，同意将国防开支占GDP比重大幅提高至5%，并承诺深化跨大西洋防务工业合作、消除军工贸易壁垒。^②这一协议本质上是欧盟在追求防务自主过程中，对北约框架下美国长期坚持的“三不”原则（即欧洲防务建设不能与北约脱钩、不能与北约重叠、也不能歧视非欧盟北约国家）的再次正式保证，标志着欧盟防务赋能只能在美国参与和控制的前提下，有限地提升工业基础与危机应对能力。这一根本性张力，决定了欧盟防务自主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能是在北约框架内受监管的有限自主。在经济与科技领域，欧盟的赋能努力除了面临发展与安全的悖论外，还面临开放与自主的悖论。欧盟的繁荣根基在于全球供应链与单一市场的开放性，其“开放的战略自主”理念试图在维护开放性的同时，通过产业政策与供应链“去风险”来增强自身韧性。^③然而，其旨在强化自主的产业干预与经贸壁垒（如《关键原材料法案》《欧洲芯片法案》）本身就蕴含着滑向保护主义的风险——既可能损害内部市场竞争力，也易引发主要贸易伙伴反弹，进而侵蚀欧盟作为全球贸易支柱的制度信誉。欧盟不得不在“经济主权”与“全球化收益”之间艰难权衡。

二是权威基础的消散与集体行动的迟滞。在赋权层面，欧盟面临的根本困境是契约型权威与情感型权威的双重流失。一方面，作为欧盟赋权核心机制的契约型权威——以超国家机构、法律框架与共同政策为核心的制度能力——正受到内部法治争议、疑欧势力崛起与成员国“再国家化”倾向的持续侵蚀。^④另一方面，作为“规范性力量”根基的情感型权威同样趋于流失。长期以来，欧盟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其市场体量与制度能力，更植根于一种道义感召力，即以价值观引领、以规范示范、以包容性议程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High Representative, “White Paper for European Defence Readiness 2030”, 2025-03-19, p. 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white-paper-for-european-defence-readiness-2030_en, 访问日期:2026-01-12。

^② NATO, “The Hague Summit Declaration”, 2025-06-25,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6705.htm, 访问日期:2026-01-13。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A Competitiveness Compass for the EU”, Brussels, 2025-01-29, https://commission.europa.eu/document/download/10017eb1-4722-4333-add2-e0ed18105a34_en?filename=Communication_1.pdf, 访问日期:2026-01-13。

^④ 姜昊、冯仲平：《转向“去欧洲化”：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欧盟对外政策》，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9期，第74-86页，这里第74页；Urszula Jaremba/Jasper Krommendijk, “Luxembourg Has Spoken: Polish and Dutch Judges’ Satisfaction With Rule of Law Judgements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October 202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jcms.70043>, 访问日期:2026-01-13。

赢得他者自愿追随的道德资本。然而,这一权威根基正从内外两个方面加速流失。对内,民粹主义兴起与法治原则争议持续侵蚀欧盟作为“价值共同体”的自我叙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与欧盟委员会的法治争端,反复暴露出规范承诺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裂隙。对外,欧盟试图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数字市场法》等工具将监管标准转化为地缘政治杠杆。这本是赋权手段的创新,却在操作层面日益滑向单边工具化。加之欧盟在外部压力下屡屡作出现实妥协,如在美欧关税战中接受15%的普遍关税,^①使其“规范性力量”的道德权威与行动一致性持续受损,他者对其规范主张的信任度与追随意愿亦同步下降。与此同时,欧盟的集体行动能力面临深刻的共识赤字。成员国间在地缘政治取向、威胁认知与利益优先序上存在显著分化。其中,中东欧国家在安全上高度亲美,南欧国家优先关注经济复苏与社会福利,法德轴心在战略自主的推进节奏、覆盖范围与实现方式上亦存在策略分歧。这种分化在军援乌克兰、对华“去风险”力度等关键议题上暴露无遗,使欧盟屡屡陷入决策迟滞与最低共识陷阱,难以形成统一的地缘政治行动。危机驱动的临时团结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战略体系,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高昂与路径依赖持续制约着欧盟将政治意愿有效赋权为超国家行动的能力。

赋能困境与赋权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强化、彼此叠加。这在本质上是欧盟作为超国家行为体,在实力建构进程中面临的生成性困境。欧盟既难以像传统主权国家那样通过强制性权力集中资源、统一意志,又无法完全依赖规范性权威替代物质能力。这一结构性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构成欧盟战略自主深化的“天花板”,并使其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高度敏感、对内部共识的波动亦极度脆弱。

(三) 欧盟战略自主的路径选择

面对外部环境的双重挤压与内部实力建构的结构性困境,未来欧盟战略自主实践不太可能呈现单一、坚定的路线,而将形成一种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议题分化为特征、以有限自主为目标的“弹性实用主义”策略框架。其核心逻辑并非全面追逐自主的理想状态,而是在识别关键脆弱性与权衡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实施有选择、有条件、有层次的能力建构与对外博弈。

一是赋能策略,即议题驱动下的选择性赋能。欧盟将采取高度务实的态度,根据不同领域的紧迫性、依赖程度及自身比较优势,进行“菜单式”的能力建设。在能源安全、基础防务能力、关键原材料与半导体供应链、战略基础设施保护等生存关键领域,欧盟将着力构建“战略堡垒”,通过产业政策、公共采购、投资审查、研发资助等工具组合,打造“不可胁迫”的非对称反制能力,确保在极端情境下的生存与行

^①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n a United States-European Union Framework on an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Fair and Balanced Trade”, 2025 - 08 - 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8/joint-statement-on-a-united-states-european-union-framework-on-an-agreement-on-reciprocal-fair-and-balanced-trade/>, 访问日期:2026 - 01 - 13。

动自由。在数字治理、绿色转型、数据保护、人工智能伦理等规则主导领域，欧盟将依托其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地位与先发的监管能力，持续巩固和输出“布鲁塞尔效应”，将内部标准外化为全球规则。这一领域的赋能逻辑不是与对手比拼硬实力，而是以制度创新与规范引领换取规则主导权与国际话语空间。在核威慑、太空战略、量子计算、下一代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与终极安全领域，欧盟将继续维持与盟友（尤其是美国）的必要协作与风险共担。此类领域投入门槛极高、回报周期漫长，强行追求自主既不经济也不现实。因此，欧盟的策略定位是“保持跟进、防范锁定”，避免自身被排除在外。

二是赋权策略，即强化“混合化杠杆”的功能与使用。面对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规范性权威边际效用递减的双重约束，欧盟的对外赋权逻辑从长期依赖的“以规范塑认同、以示范引追随”的软性感召模式，转向“以规则筑壁垒、以筹码换忠诚”的混合化杠杆模式。这一转型并非对规范性目标的放弃，而是以更具交易属性、更富干预色彩的手段，为既有规范议程注入新的执行力与反制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监管权力武器化为地缘经济杠杆。欧盟通过市场准入、成本传导与制度捆绑，将对规范的遵从转化为竞争准入的前提条件。《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条例》、《反经济胁迫条例》、公共采购工具、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在“规则自卫”与“价值推广”的双重叙事下，发挥了保护内部市场、塑造外部竞争环境、反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复合功能。其二，周边治理从“转型激励”滑向“排他性交易”。在西巴尔干、东欧伙伴国及北非等地区，欧盟将发展援助、安全合作与政治条件深度整合，以更具干预性、排他性的方式巩固自身影响力。其政策逻辑不再是“等待欧洲化”的单向示范，而是“以条件换忠诚”的双向交易，要求受援国在地缘政治站位、规则标准采纳、外交政策协调等维度作出明确对价。^①其三，对“全球南方”的战略取向呈现出“标准输出+市场锁定”的双重逻辑。欧盟日益将“全球南方”视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战场与未来规则体系的市场腹地，通过对铁路、数字基建、能源网络等战略基础设施的融资与承建，提前锁定下一代技术标准的欧洲路径，将南方国家长期嵌入其主导的监管生态圈。^②

三是伙伴关系管理策略，即在“为自主而合作”的逻辑中管控阵营化风险。一方

^① Erik van der Mare, “The EU’s geopolitical dream is dying in its own neighbourhood”, *LSE European Politics and Policy Blog*, 2025-12-03, <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25/12/03/the-eus-geopolitical-dream-is-dying-in-its-own-neighbourhood/>, 访问日期:2026-01-13;赵雅婷:《地缘竞争与安全转向:欧盟发展政策调整及现实挑战》,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5期,第45-51页,这里46-49页。

^② Joseph Borrell,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The Four Tasks on the EU’s Geopolitical Agenda”, The Diplomatic Service of European Union, 2024-02-25, <https://thebrief.co.ke/foreign/munich-security-conference-four-tasks-on-eus-geopolitical-agenda/>, 访问日期:2026-01-13;顾苏:《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调整——基于地区间主义视角的分析》,载《欧洲研究》,2024年第5期,第115-146页,这里第125页;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4-12-08, <https://geopoliticalcompass.com/three-worlds-the-west-east-and-south-and-the-competition-to-shape-global-order/>, 访问日期:2026-01-13。

面,为弥补能力短板、对冲对外依赖的风险、增强自身自主性,欧盟将加速拓展与所谓“志同道合”伙伴(如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在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标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乃至海上安全等领域的排他性合作网络。^①这种多元化伙伴关系策略旨在分散风险、增强集体谈判筹码,是欧盟在不对称相互依存时代管理外部依赖的理性选择,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支配欧盟的对外战略选择。另一方面,这一策略蕴含着阵营化风险,使欧盟战略自主与其开放多极化愿景之间形成张力。在经济上,“友岸外包”“小院高墙”以安全之名构筑排他性经济圈,背离自由贸易原则,割裂全球产业链;在地缘政治上,伙伴网络内嵌“制度性对手”指向,使其深度嵌入对抗性阵营,进而陷入“因合作而失自主”的悖论;在规范上,对“志同道合”者的准入优待与对“非志同道合”者的制度排斥,暴露了欧盟“规则秩序”叙事下的双重标准,加速规范性权威耗散。未来,欧盟能否在增强自主与维系开放之间划定边界、在深化伙伴网络与避免阵营化之间保持平衡,已成为对其联盟管理能力的关键考验,也构成其战略自主路径选择中较为棘手的矛盾之一。

总而言之,欧盟战略自主的未来发展将是在“自主愿望”与“依赖现实”、“全球主义”与“集团化”、“规范性理想”与“地缘政治工具化”等多重结构性困境中寻找动态平衡的进程。多重结构性困境揭示了欧盟战略自主的深层悖论:自主的实现恰恰依赖于对其所试图超越的依赖关系的持续管理。欧盟战略自主的历史价值,或许正在于它证明了在深度相互依存的全球时代,自主不再意味着孤立的行动自由,而是行为体在依赖网络中有效配置自主权、在多重结构性约束中持续开辟战略空间的能力。这种“自主悖论”并非欧盟独有的困境,而是当代国际行为体普遍面临的战略命题。欧盟战略自主的这一进程将持续深刻影响大国关系,使跨大西洋关系更趋复杂,也为中欧关系带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双重性。对世界而言,欧盟的战略自主既可能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治理民主化的积极变量,也可能因“武器化”“集团化”操作而成为技术脱钩与规则分裂的加速器。最终,欧盟能否将内外张力转化为一种更具包容性、创新性与韧性的全球治理方案,在捍卫自身利益的同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一条超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路径,将从根本上决定其战略自主的历史价值与世界意义。

责任编辑:朱苗苗

^① 施锦芳、隋霄:《日欧经济安全合作:动因、基础、内容及评析》,载《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1期,第131-155页,这里第135-139页;European Commission,“A Competitiveness Compass for the EU”。